

唐宋词选

夏承焘 盛弢青选注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222.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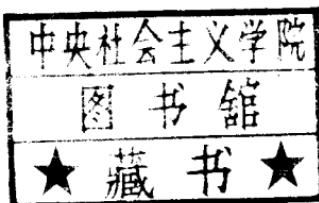
50163

唐宋词选

夏承焘 盛弢青选注



200195742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唐宋词选

夏承焘 盛弢青选注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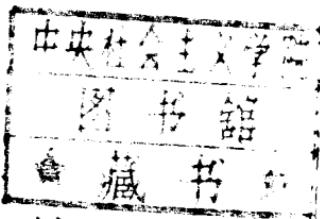
*

787×1092 1/32 8印张 120千字

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3版

1981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1—283,000册 定价0.64元



编 例

这个唐宋词的选本，在选词方面，大致有下面两种意图：

1. 选录从思想内容、艺术形式的角度来看，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作用，对后来影响较大，而能代表古典文学优良传统的作品。
2. 过去没有受到重视的作家作品，但能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感情愿望，而艺术上也能达到相当高度的，我们也加以采录。

编次和注解方面，有下面几点要说明：

1. 作家除时代不能查明的，都依时代为次；每一作家的作品，也尽量做到依时间先后编排。其中作品的创作年代有特殊意义的，就注明年代。每一作家的生平也略予介绍。
2. 除疑难的词句加上注解外，对大部分作品都简略地说明其大意，如果有体式上特殊的地方或有关的历史事实，也酌量说明。目的在于给初学的读者以了解和进一步研究的方便。
3. 有两种以上的不同的本子，尽可能选择一种；两种以上

的说法，也尽可能选用我们认为妥当的一种。引用文字如容易了解或难于译作白话就依照原文，此外尽可能用白话来作注。

4. 相同或互相有关系的注解，只在一处注明，别处参见。一般是注在前面，后面不再注。但如果后一首必须详注，前一首只要参看，就注在后一首。

5. 所有地名，用“今某省某地”，表示古某地即现在某地；用“在今某省”，表示古地名和现在地名相同，所以只注省份；用“属今某省”，表示只知道属哪一省，详细的地点还难于确定。

6. 辛弃疾词的注解，曾参考邓广铭先生的《稼轩词集编年笺注》。承邓先生将稿本借给我们，谨此致谢。

这个小本子的编选和注解，由于我们能力的限制和时间的匆促，错误一定很多，希望读者和专家们指教。

前　　言

—

词是一种配合音乐的诗歌，是唐、宋时代的乐府诗。它产生于隋、唐之间，到中、晚唐时才广泛流行起来，这是跟当时社会的需要和音乐、诗歌的发展，有着密切的关系的。

唐朝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，经济达到了高度的发展，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都非常发达，从而促进了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、汉族文化和其它各民族文化的交流，使唐朝文化不论在诗歌、音乐、舞蹈、建筑、雕刻、绘画等方面，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就。当时各地新兴的大都市，商业日益繁荣；城市居民爱好歌唱、音乐，需要新的歌曲；词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逐渐流行的。

唐朝的音乐可以分做三类：一，雅乐，是汉魏以前的古乐。二，清乐，是汉魏六朝以来的民间音乐。三，燕乐，主要成分是周隋以来西北各民族的音乐结合民间音乐而成的新乐，因在当时的宴会上作演奏用，所以称做“燕（宴）乐”。雅乐在当时已经不中听了。清乐的节奏比较单调和舒缓，不能跟西北各

民族奔放热烈的音乐相比，无法满足迅速发展的商业都市居民的要求，所以当西北各民族的音乐大量输入的时候，它就相形见绌了。燕乐的音律变化繁多，能满足城市居民文化生活上的需要，在音乐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。这种音乐也影响到民间小调和文人诗歌，大部分的词就配合了这种新音乐产生出来并流行起来了。它是“胡夷、里巷”乐曲的混合物（“胡夷、里巷”是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中语），它把我国的诗歌样式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。

词不仅跟音乐的发展密切相关，也跟诗歌的发展密切相关。在六朝南齐的永明年代（四八三——四九三），诗人们发现了汉字的声调（四声），他们便主张利用声调来加强诗歌的节奏。发展到唐朝，创造出律诗来。词这种文学样式，吸收了这方面的成就，文人们在依照乐谱来填词的时候，利用声调的抑扬长短来配合音律。这样，虽然使词受到乐谱、声调的限制，但是在乐谱失传后，它的文字本身仍有其音乐美。

二

适应唐代文化生活上的需要，结合当时在音乐和诗歌上发展而流行的词，它的前身是民间小调，见于唐朝崔令钦所著《教坊记》的《曲名表》里。从这些曲名来推测它的内容：有些可能是反映农民的劳动生活的，如《舍麦子》《挫碓子》等；有些可能是反映渔民生活的，如《渔父引》《拔棹子》等；有些是反映军人生活的，如《破阵子》《怨胡天》《怨黄沙》等。

从《曲名表》里，更可看出唐朝民间小调对社会现实有相

当广泛的反映。中唐时代的诗人李绅、元稹、白居易所作的《新题乐府》，有好些就和这些民间小调的内容相近似。如《曲名表》里的《守陵官》《怨陵三台》近似《新题乐府》里的《陵园妾》；《官人怨》近似《上阳白发人》；《羌心怨》近似《缚戎人》；《破南蛮》近似《新丰折臂翁》；《恨无媒》近似《井底引银瓶》（此说据任半塘先生《教坊记笺证》未刊稿）。

《曲名表》里的民间小调虽然都已亡失了，但是唐代民间词却还有流传。清朝光绪年间，在甘肃敦煌石室里发现了几百首写本曲子词，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材料。就反映唐朝民间生活说，其中有写沦陷于外族的痛苦的，有写得归故土的欢悦的，有歌颂“归义军”的民族英雄的。唐朝从太宗以后，吐蕃强盛，有时跟唐朝结盟，有时又发兵侵扰；敦煌逼近吐蕃，经常发生战争；人民就用词这种文学样式来反映民族矛盾，表现重大题材。此外，在一些市民阶层的词里，还写了征夫思妇的厌战情绪，反映了商人的生活，旅客的辛苦，妓女的苦痛和愿望，歌女的恋情，也写出了人民的真挚的恋歌。这些词，它们所反映的生活是广阔的，感情是深厚的，跟汉魏以来的乐府诗同样是反映了人民的真实生活。

在这个选本里，我们首先选录了这部分作品。象写爱情的《菩萨蛮》，那种海枯石烂始终不移的精神，确实是感情真挚，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。就是反映妓女生活的《望江南》，用任人攀折的“曲江临池柳”来自比，也是真切地反映了被压在底层的妇女的痛苦心情。更值得注意的，在这些敦煌发现的词里已经有长调^①。这使我们看到，词在民间，它的题材是广

阔的，内容是丰富的，风格是多样的。

三

词这种文学样式在民间日益流行的时候，就引起了文人的注意。文人摹仿它来作新词的，在初唐时就开始了，不过在初、盛唐时，文人作词的还很少。李白作的《清平调》三章，实际上是七言绝句，还不是长短句的词。（相传李白作的《菩萨蛮》《忆秦娥》，有人以为不可靠。）唐朝文人作词，到中、晚唐才逐渐多起来。象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，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，是摹仿渔歌的。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，也摹仿民歌写词，象《忆江南》：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！”这样的词，吸收了民间词清新的风格，加上文人在创作诗歌中的艺术修养，是能够在民间词的基础上有所提高的。

文人词到了晚唐，做的人更多了，却逐渐走上了歧路。这可用晚唐人的词的总集《花间集》做代表。欧阳炯在《花间集》的序言里，说明当时的“豪家”自制新词，是因为“绮筵公子，绣幌佳人”需要这些新词来供娱乐。他们的新词，“自南朝之宫体，扇北里之倡风”，把靡靡之音的宫体和倡风都扇扬起来了。

① 明刻本《类编草堂诗余》把词分成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三种，以一首词的字数在五十八字以内的为小令，五十九字到九十字的为中调，九十一字以外的为长调。清人万树指出，这样分是没有根据的。按小令、中调、长调的说法已经通行，为了在说明上方便，所以这里沿用了。唐五代文人词大都是小令、中调，敦煌词已有长调，所以更值得注意。

这是跟晚唐的政治经济有关的。唐朝从安史乱后，北方残破，跟着造成军阀割据的局面，经济的中心南移。南方各地割据的藩镇成为封建王国，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，加上豪商巨贾的夸富争奇，造成了畸形的繁荣。《花间集》里很多的词就是为这些豪门巨贾以及秦楼楚馆服务的。这些词用了华丽的词藻，加以精巧的雕琢，制成了大量的宫词艳曲。这样的词，内容贫乏，风格浮艳，所反映的生活极为狭隘，这就离开了民间词的正确发展方向。温庭筠是这派作家的代表。

《花间集》以外的晚唐五代词人，著名的是南唐的冯延巳、李璟、李煜。其中突出的是后主李煜。李煜在南唐灭亡以前的词，也反映浮华的宫廷生活；南唐灭亡以后被掳北去，他的词情辞哀苦，用白描手法写出他自己的深切感受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。”但他悲叹的是失去了故国和一个国君所拥有的一切，内容与民间作品有很大的距离。但跟《花间集》里的词比起来，他能够从涂饰浮艳的词风中自拔出来，用清丽的语言，白描的手法，高度的概括力，让词走上了抒情的道路。在词的发展史上看来，李煜是一位突出的作家。

四

北宋初期，结束了五代的混乱局面，经过四五十年的休养生息，社会经济又逐渐繁荣起来。这时候的达官贵人，象晏殊、宋祁、欧阳修等都爱好写词，并崇尚典雅。他们认为词跟诗不同，不仅在于是否配合音乐上，还在于所表现的风格上。他

们认为词要柔婉，要细致缠绵。这样，词的风格只有婉约派，不再是多样化了；题材狭隘了，篇幅一般是短小的了。这一时期词风比较突出、不同于婉约派的有王安石、范仲淹。范仲淹带兵去抵抗西夏，他所作的《渔家傲》词，反映边塞将士的生活和心情，是宋初文人词中颇饶人民性的一首作品。

晏殊、欧阳修那种柔婉短小的词，要是用来表现复杂繁变的都市生活，那就不行了。这些柔婉短小的词，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，于是适合城市居民需要的词就跟着产生了，其中最突出的是柳永的词。

柳永的《鹤冲天》词讲到他自己的生活，说“黄金榜上，偶失龙头望”，他自以为“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”，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。他给妓女做词，过着“浅斟低唱”的生活，这样，使他的词跟晏殊、欧阳修有所不同。他反映的是都市生活：都市的繁华、旅人的辛苦、妓女的生活和心情等。题材改变了，内容复杂了，短小的篇幅不够容纳，因之他写了不少长调；在风格上，也由含蓄转向铺叙。这是北宋词的一次转变。

南宋藏书家陈振孙说：“柳词风格固不高，而音律谐婉，词意妥帖。承平气象，形容尽致，尤工于羁旅行役。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）这话指出柳永的词擅长写旅客的辛苦，这跟他一生的飘泊有关，所以写得真切。象《八声甘州·对潇潇》一首，全用铺叙笔法来写景，跟以前的词写景比较简练的不同。词人透过这些景物描写，从“凄紧”“冷落”“残照”里，反映出旅人凄苦孤寂的心情，构成一种气氛。他面对着“红衰翠减”，感叹韶光的飞逝，也透露出飘泊无成的感慨。在这些景物描写里，表现

了词人的精神面貌，所以成为名篇。

柳永的词，也有轻薄浮艳的毛病。题材一般是写都市繁华、妓女生活、离愁别恨，思想性不强，风格不高。从浮艳中解脱出来，大大地开拓词的境界，用它来表现各种广阔的生活，打破词的柔婉的风格，加强词的思想性，那就是苏轼。苏轼词的出现，是北宋词的又一次转变。

苏轼是北宋的杰出的文学家。他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因此受到排挤。他经常在贬谪中过着忧患失意的生活。他到过很多地方，直到海南岛。他具有豪爽开朗的性格，加上他丰富的经历、杰出的才华，这些表现在他的词里，给词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。当时一部分士大夫把词作为酒边尊前娱乐遣兴之用，苏轼改变了这种轻视词的态度，他把词用来抒写自己的性情、抱负、胸襟、学问，从而提高了词的地位。

他的传诵的名作《念奴娇·大江东去》一首，大气磅礴，刻划出雄伟的景象，确实是以前所没有的。以前，我们只能在诗里碰到这种豪迈的境界。到他手里，才打破诗和词的界限，把这种境界写到词里。不仅这样，他还要在词这种容量不大的篇幅里刻划英雄人物，如“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”数句，写周瑜潇洒的风度、英俊的气概，在词里也是很突出的。但是他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，不免感慨年华老去、事业无成，因而叹息“人间如梦”，也带来一些消极的情绪。

苏轼的词，反映了广阔的生活面，具有多样的风格。象《浣溪沙》五首：“麻叶层层棘叶光，谁家煮茧一村香？”“簌簌衣巾落枣花，村南村北响缲车”，具体地反映了农村风光和农家

的劳动生活。“日暖桑麻光似泼，风来蒿艾气如熏，使君元是此中人”，写他对农村生活的喜爱。这种词，跟以前的脂香粉腻浓艳华靡的词，风格完全不同了。象《水调歌头》：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”这里，表现作者即使在政治上受到贬谪，但他并不消极出世。这种婉曲的用心，这种倦倦不忘用世的心情，是感人的。

苏轼的词，不论在词的境界的开拓上，在思想性上，在风格上，都高于他以前的词人。只是他的这种成就，当时人并不都能认识到。有的用老眼光来看，认为只有婉转缠绵的风格才算词家本色，如北宋陈师道说：“子瞻（苏轼的字）以诗为词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虽极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”（《后山诗话》）有的批评他的词不讲究音律，如晁无咎说：“居士（苏轼称东坡居士）词，人谓多不谐音律，然横放杰出，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。”（《复斋漫录》）可见当时对词的看法，还比较片面，只是认为词的风格要柔婉，要讲究音律，不赞成别的风格。这种较片面的主张，更其符合达官贵人的要求；因为他们的词大都是写儿女恋情和闲愁绮怨，内容单调，只能在词藻音律上用工夫，趋向形式主义。因此到了北宋后期，由于统治阶级对词的喜爱，助长了形式主义的风气，于是讲究音律、讲究雕琢的词大占上风，周邦彦便是其中的代表。

宋徽宗崇宁四年设立了大晟乐府，任用周邦彦做提举。周邦彦精通音律，审定各种乐谱，又新创了许多曲调，他的长调写得细致而含蓄，表现出富丽精巧的风格，跟柳永的长调不同。但总的说来，题材是狭隘的，内容显得空泛，主要是在音

律和字句雕琢上用工夫。他在词的成就上，虽远远不能和苏轼相比，可是当时一般人认为苏轼不是正宗，而他的词才是正宗。如刘肃说，他的词“缜密典雅，流风可仰”，“真足冠冕词林”（《片玉集》注）。陈郁说他“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”（《藏一话腴》）。沈义父云：“作词当以清真为主，下字运意皆有法度。”（《乐府指迷》）可见他的词在当时士大夫中具有极大影响，获得极高评价。苏轼的词，境界高，非有丰富经历、真实感情和高度才华的学不到；周邦彦的词内容空虚，只是讲究雕琢，可以学，“流风可仰”，“皆有法度”，都说明这一点。这样，词走上偏重形式的歧路，周邦彦大大起着推动的作用。

尽管周邦彦等词人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，但杰出的词人，并不完全跟他们走。这里我们要提到女词人李清照，她十八岁嫁给赵明诚，过着美满的生活，晚年经历了国破家亡、流离颠沛的遭遇。她前期的词写出一个上层妇女的心情，后期的词有着凄苦的情调、深沉的伤感，象充满哀怨的《声声慢》《武陵春》都是。她的感情虽然有消极的成分，但我们应当看到，这是时代的灾难在一个孤苦伶仃的妇女身上的反映。《永遇乐》还反映了怀念故国的感情，让我们从她的词里嗅到了时代的气息。她的词用白描的手法，词语新颖，形象鲜明，真切地表达她的感情和反映她的生活，艺术上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，那更不是周邦彦等人所能比拟的了。

五

从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，词又有了新的发展，那是时代造

成的。北宋末年，金人攻下汴京，一次民族矛盾大爆发了，它
的过程和结局的惨酷，在我国民族史上是空前的。于是词人
们继承了苏轼所开拓的境界，用来反映当时的主要矛盾，使得
词有了新内容，获得了新生命，并且发出它从来未有的光辉。

由于面临这个大时代，由于接触到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并反映了这个主要矛盾，在南宋词坛上成就了许多大作家、好作品。这些词的思想内容也由此打破了旧的局限，《花间集》和柳永的“浅斟低唱”的词，到此和大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了。

这时期，在民族矛盾之外，又有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。赵宋王朝是我国封建史上一个很专制的王朝。在唐朝，杜甫、白居易诸诗人还可能创作许多讽刺封建统治的诗篇，但在宋代的文学作品里是比较少见的，即使偶然有些象梅圣俞、苏轼诸人讽刺时事的作品，也决不能象杜甫、白居易那样说得露骨，因为那是赵宋王朝所不能容许的。南渡以后，怯懦偷安的赵构集团恐怕失去他们偏安一隅的皇位和富贵，不敢发动人民抗战，因此和广大人民尤其是许多民族志士发生了尖锐的矛盾。陆游、辛弃疾一班人在国难严重的时候，虽然作了许多慷慨激昂的词，但一接触到这个矛盾，便只有微词婉讽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象岳飞，只能唱“欲将心事付瑶琴，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？”本来，晚唐、北宋的文人词，大都用美人香草来为妓女歌唱；到了这班有思想有抱负的作家手中，也就用美人香草之辞，写他们对民族国家的隐忧幽愤，和政治生活中的摧抑不得志，于是这些作品也就接上《离骚》的传统，带有很真挚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。这种反映民族矛盾、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词，

是词中的最高成就。就是唐代民间的敦煌曲子词里，虽然也有过反映民族矛盾的作品，但由于历史环境不同，也不能跟它相比。总之，南宋这类词所反映的生活面更广阔，更深入。当时，民族志士对外和入侵者战，对内和权奸战；他们主张报仇雪耻，抱有挽救国家民族的伟大志愿；对沦陷区人民被虐杀、奴役，怀有深切的同情；他们又遭受到南宋小朝廷排挤压抑，有无比的悲愤；所以他们的词，内容深沉，音节悲壮苍凉，摆脱了晚唐、五代以来绮罗香泽的窠臼，继承了苏轼豪放的词风。

这时期最杰出的是辛弃疾。比他年辈稍长的是陆游。陆游的创作，主要是诗，留下来的词篇较少。他在四十六岁时，四川宣抚使王炎邀他到幕府里去。他穿了军装，到过大散关和陇县一带，深入西北军事前线，接近沦陷区人民，想实现他恢复失地的壮志。他在《谢池春》里表现了参军时的慷慨心情：“壮岁从戎，曾是气吞残虏。”他是有蔑视敌人的气概的。“朱颜青鬓，拥雕戈西戍”，他正在壮年，精力充沛，要亲执干戈来保卫祖国。他还在《汉宫春》里写前线的生活：“羽箭雕弓，忆呼鹰古垒，截虎平川。”在没有战事时，带着弓箭去打猎。“淋漓醉墨，看龙蛇飞落蛮笺”，回去起草军书。当时人称他为“诗情将略，一时才气超然”。这里，诗人的豪情壮慨，都形象地刻划出来了。可是壮志难酬，他终于郁郁归来，这是诗人深感痛心的事。陆游不仅擅长写慷慨激昂的词，就是咏物小词，也把自己的精神面貌写进去。如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：“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这里表现他即使被嫉妒，受排挤，成泥作尘，而高洁的志操是始终不变的。

辛弃疾是南宋伟大的词人。他二十一岁参加山东耿京的起义队伍，二十二、三岁时从北方沦陷区南下，曾经追斩起义军叛徒义端和尚，又突入敌营缚取叛徒张安国。二十六岁作《美芹十论》上宋孝宗；三十岁作《九议》上宰相虞允文，都是救亡图存的大计划。他的恢复失地的抱负并没有实现。在历次任地方官时，不论在政治和军事上都表现了他的才干。

辛弃疾起义南下时的豪情壮慨，南归后的雄图大略，在词里都有所反映。他用词来反映当时的主要矛盾，写出重大题材，表现出豪迈的气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。象《鹧鸪天》：“壮岁旌旗拥万夫，锦檐突骑渡江初。”写出起义南归时候的声势。南归后，念念不忘恢复，象《破阵子》：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”这里写军容之盛，想望收复失地。但末句却不能不感叹“可怜白发生”。他这种心情，也通过怀念古人来表现。象《永遇乐》：“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”这是用刘裕北伐的故事。这种词的音调是慷慨激昂的。此外，他还用婉转的风格来表现爱国精神。他在南归以后，看到南宋统治集团的怯懦偷安，满腹愤慨，但在封建势力的高压下，不得不采用微词婉讽来写词，如《摸鱼儿》：“休去倚危栏，斜阳正在，烟柳断肠处。”看到南宋朝廷象斜阳那样处在没落的境地，无限悲痛。这样的词，跟《离骚》中所表现的爱国感情是相契合的。

辛弃疾的词，继承了苏轼的传统，用词来反映各方面的生活，具有各种不同的风格。刘克庄说：“公（指辛）所作，大声镗鎧，小声铿锵，横绝六合，扫空万古；其秾丽绵密处，亦不在小